

農工黨：促設京津冀環保基金

黨派建言 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農工黨關於改善京津冀生態環境質量的提案，已被全國政協正式立案，其中建議有望獲國家環保部採納。去年，京津冀三省市農工黨組織聯合調研發現，河北治污能力在京津冀三地中最弱，又面臨淘汰過剩產能、發展經濟等壓力，短期內僅靠本省難以改變現狀，應從財政體制方面破解此難題。今年全國兩會，農工黨中央就此呈交《關於建立京津冀生態環境保護基金的建議》，呼籲設立300億元京津冀生態環境保護基金，將資金主要向河北傾斜，支持其加快推進生態建設。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何凡

在近日舉行的「京津冀區域環境保護研討會」上，農工黨北京市委副主委劉迎表示，針對京津冀地域相連、環境治理須協調應對，三地首次展開跨地區、跨部門的聯合調研，並形成兩份建議文件。文件呈報後獲高度重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等批示，責成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治理協調小組辦公室組織研究落實。



■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黨中央常務副主席劉曉峰。本報北京傳真

津冀排放強度高出北京數倍

北京市環保局原總工程師周揚勝指出，調研發現，三地污染程度不同，津、冀不僅污染排放總量高於北京，且排放強度高出北京很多倍。同時，機動車排放污染嚴重，成為最難治理的區域污染源。

他表示，河北單車排放污染程度高，以單車每年排氮氧化物為例，2013年，天津、河北分別是北京的1.5、2.7倍；機動車排放污染監管力量方面，京津冀三地的編制人數比是527：22：1。而由於經濟發展水平、自身財力所限等，河北僅靠本省能力難以實現同京津同步治理，進而將延緩區域環境質量改善的進程。

設基金傾斜補河北短板

農工黨中央《關於建立京津冀生態環境保護基金的建

議》指出，河北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京津存在「斷崖式」差距，其人均GDP僅為京津的1/2至1/3，人均財政收入僅為京津1/3至1/4。

同時，河北承擔着化解過剩產能、治理大氣污染、推進結構調整的重要任務。初步測算，僅完成6,000萬噸鋼鐵壓減任務一項，河北直接資產損失就有約1,800億元，涉及60多萬直接和間接就業人員需要妥善安置，需支付社保養老金近200億元/年，數年內影響稅收557億元。

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農工黨中央專職副主席何維介紹，該提案建議由中央和京津冀三地設立京津冀生態環境保護基金；由國家設立專門的基金理事會統籌資金的管理和使用，並接受審計部門監管和社會公眾監督。根據各地治理任務輕重和實際財政情況，按一定比例分配資金，主要向河北傾斜，80-90%用於



■近年來，河北加快推進清潔能源替代，打造京津冀清潔能源基地。圖為張家口壩上地區的光伏發電廠。

新華社

河北。重點支持開展節能減排、污染防治、水源涵養、循環經濟發展、環境監測監管能力建設和生態修復等重大生態環保工程等。

京津冀環保規劃擬月底前出台

環保部副部長李干傑（見右圖）在此間指出，國家發改委與環保部正牽頭編制的《京津冀協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已完成徵求意見階段工作。按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统一安排佈局，要求該規劃在本月底前出台實施。他透露，該規劃包含大氣污染防治、水安全保障等六個重點任務，同時提出設立京津冀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基金。

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黨中央常務副主席劉曉峰表示，應盡快建立健全跨部門跨地域的環境保護協調工作機制，將水、大氣、土壤污染防治三項行動計劃統

籌實施。將現有行動計劃工程性治理模式逐步向體制管理與法治保障方向過渡，大力改革環保投融資體制，加快發展京津冀地區的環保產業，拉動民生領域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在調結構、保增長、促就業等方面發揮環保產業的巨大作用。他並強調，關於京津冀協同發展和環境保護等問題，要更好地通過各種協商渠道，努力尋求最大公約數，增進最大共識度，形成最大凝聚力。



卞晉平：正在制定全國政協制度體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政協理論研究資深學者卞晉平（見圖）近日撰文指出，政協的權利就在於可以「說」，話語權是政協最大的政治權利，也是它在整個政治體制中具有獨特作用的出發點。他並透露，全國政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正制定着着眼于構建結構合理、程序清晰、科學規範的人民政協制度體系，包括制定進一步明確政協協商內容、形式、程序、成果運用以及如何與黨政機關銜接的制度。

協商民主新格局四特點

卞晉平認為，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人民政協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和中共中央頒布《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為標註，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展現出一種新格局。協商民主新格局的「新」，就新在黨中央立足於頂層設計，把過去一項由專門機構施行、適用於特定範圍的民主協商制度，發展成為一項覆蓋各個領域、適用於各個層次的普遍的民主制度。

從特點看，一是廣泛拓展民主協商的渠道，實現了協商形式多樣化；二是民主協商的內涵進一步擴大，群眾利益成為新格局下協商活動關注的重點；三是民主協商的主體擴大至全民，提出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四是基層協商成為新格局下協商民主的重點和亮點，明確要求民主協商工作重心下移。

協商是政協工作的主業和常態

他並指出，政協「專門協商機構」的定位，明確了它與其他協商形式的另一大區別。政協的工作就是協商，協商是政協工作的主業和常態；政協商量的不是自己的事，而是參加政協的黨派、團體和界別以及廣大委員共同關心的事，是國事民事天下事。因此，政協的協商，與其他機構開展的協商從內容上、範圍上、節奏與頻率上都是有區別的。

在卞晉平看來，各級政協要適應新形勢，至少要注意做好兩點：一是積極適應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新形勢，切實搞好與其他協商形式之間的銜接與協作。二是積極適應政協協商密度、力度加大和協商工作經常化的新形勢，對政協內部各界別、各專門委員會活動以及對口協商、界別協商、專題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多種協商形式進行統籌整合，建立更加合理有序、運轉高效的協商工作新機制。「全國政協在此兩方面均已取得明顯進展。」他說。

梁偉浩：香港應主動參與「十三五」規劃制訂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任一龍、田一涵）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得利鐘錶集團董事長梁偉浩（見圖）在接受本刊採訪時指出，香港應積極主動地參與「十三五」規劃的制訂。發動社會各界群策群力，建言獻策，特區政府責無旁貸。

他說，「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不能低頭只看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應高屋建瓴，在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中找準定位、明確使命；要堅持國際視野，善於把握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度調整、新一輪科技和產業變革迅猛發展帶來的重大機遇，及早謀劃、及早佈局，站在更高的起點上規劃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

「十二五」對粵港澳關係研究不夠全面

梁偉浩說，香港要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增強產業創新能力，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十二五」規劃對珠三角周邊地區產業發展和競爭合作關係研究不夠全面，尤其是對深化粵港澳合作，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特別是珠三角與香港的錯位競爭和合作關係的研究不夠深入。

他建議特區政府，集思廣益，發動香港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業、行業協會、國際組織等社會力量，動員他們提出申請競標，對這些重點圍繞關係「十三五」時期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開展研究。特區政府應激勵各方專家能人，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為「十三五」規劃出謀劃策。對有貢獻者，建議政府給予獎勵。

香港可競標「十三五」前期課題

「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十三五』規劃前期研究重大課題遴選公告》，有25項課題供遴選研究。」梁偉浩說，這些課題中，有6項是香港具有優勢、可以參與競標的，如「十三五」信息經濟發展研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研究、服務業發展重點和機制研究、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和風險防範研究、對外開放戰略及開放新格局研究、企業「走出去」發展戰略研究。遴選成功的單位，還將獲得國家發改委經濟補助。

他進而指出，內地建言「十三五」規劃，民眾皆可微博微信參與。「香港是否也可以在政府網站開設這樣的建言專欄呢？這樣將極大方便更多普通香港市民貢獻才智。」

余永定：今年人幣匯率總趨勢可能貶值



■全國兩會期間，來自金融界的政協委員互相交流（從左到右依次為經濟學家黃方毅、余永定、國家進出口銀行前董事長李若谷、中國工行副行長張紅力）。何凡 攝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何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原委員余永定在全國兩會期間向記者指出，由於中國央行具有強大的干預能力，今年人民幣變化趨勢，最終取決於央行的匯率政策。鑒於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勢，央行可能對人民幣適度貶值持樂觀其成的態度。另一方面，央行可能希望人民幣匯率的雙向波動有所增加。因此今年人民幣匯率將呈現一定的雙向波

動，但總趨勢可能是有所貶值。

資本外流的損害大於熱錢流入

對於資本外流的現象，余永定表示，中國當前企業投機與套利的資本外流現象嚴重，應謹慎、漸進推動資本項下的人民幣可兌換，防止投機套利和資本外流。「目前中國經常項目是順差，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壓力卻越來越大，主要是因為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引致。企業套利和國內資產轉移到國外，共同驅動資本外流。」余永定說，如果資本外流形成規模，那麼它對中國經濟的損害會大於之前熱錢流入對中國經濟的損害。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穩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如果完全開放資本項目管制，那麼中國居民一定會提高其資產中美元的比重。假設50萬億元儲蓄存款中，有10%要換成美元，即5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近1萬億美元，這些錢如果在短期內都要兌換，就會造成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余永定說。

不能讓貶值成為暴跌

他認為，對於中國而言，在考慮資本自由化時，須考慮收益和風險。當前，資本項目的開放、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大方向沒有錯，但沒有必要也不應操之過急。工作的重點應是增強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同時，有必要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可以允許人民幣貶值，但不能讓貶值的幅度太大，更不能讓貶值成為暴跌。